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今日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從川陝甘地震談起

National Identity in Today's China: Starting from Si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doi:10.6752/JCS.200903\_(8).0009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王曉明(Xiao-Ming Wang)

頁數/Page：173-19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今日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從川陝甘地震談起

#### National Identity in Today's China: Starting from Si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王曉明

Xiao-Ming Wang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川陝甘地震已經過去半年了。<sup>1</sup>對其蒙難人數的統計報導，也早已從各種媒體上消失。我最後一次從上海的報紙上看到這個統計，是2008年8月中旬：「截至8月12日為止，四川地震造成死亡69,225人，受傷374,643人，失蹤17,923人。」就兩行字，跟在國內新聞版右下角的一則有關災區重建的投資總額的消息後面，連標題也沒有，只以一條橫線與那則消息隔開，彷彿存心不讓人看見。

—

地震之後3個月，依然「失蹤17,923人」，有那麼多屍體埋在廢墟裡，沒有挖出來！單這一句，足以讓你意識到災情的慘重。

可以從多方面解釋這份慘重。八級強震，餘震不斷，地形複雜……但是，有一個方面不能不說：歷年積累的各种弊政，明顯加重了災情。這次災區的死傷者，既是死傷於地震，也是死傷於毫無防備，死傷於「豆腐渣工程」，死傷於長期的貧窮，死傷於通訊、交

---

1 本文寫作於2008年10月間，故作者稱距離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發生以來，已過了半年。

通、醫療設施的不足，死傷於從日常管理到緊急救援的各種體制的僵硬和脆弱……

現代社會，純然受害於天災的事情是很少的，絕大多數天災，都有人禍摻雜其中。這些人禍並非只在天災爆發時才顯形，也絕非只作祟於爆發天災的地方，但因其持續、分散，後果緩慢，更因受害者尚有他途可避，它們往往不會引起劇烈的反應。

但是，天災卻以震撼的方式，將這些人禍集中暴露，令人無法如平日那樣漠然置之。「豆腐渣工程」遍布國中，上上下下說了多少年，好像都沒有什麼用。可這一次，成千上萬的學生被那些偷工減料的校舍活埋了，誰還能繼續木著張臉、不為所動？當要求被害學生的家長停止遊行的時候，災區的那位書記只能下跪了，慘烈的災情已經將人禍暴露得那麼觸目，再鐵石心腸的官員，怕也難如往日那樣一臉威嚴吧。

災難刺激了民衆，他們重新睜大警惕人禍的眼睛，災難也令許多人禍的製造者氣短神靡，至少在一段時間裡，自覺不自覺地收斂和退縮。當災民群起圍攻那些利用職權、私取救災物資的不良官商的時候，當抗議者面對員警，忿激地說：「這個時候還這麼搞，太不像話！」的時候，當舉國上下強烈要求監督捐款流向的時候，甚至當貴州甕安民怨爆發、網上議論滔滔、中央政府直接介入、肇事官員即遭革職的時候，你都能清楚地感覺到，慘烈的災難已經打破了萎靡消沉的社會氣氛，並且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改變現實的力量對比。

當然，我也看到另一種相反的可能。這半年來，主流媒體始終只講天災、諱言人禍。就連那些活埋學生的校舍，都有負責部門的官員站出來，公然否認其建築品質有問題。不要覺得這很荒唐，1950年代末的那一場大饑餓，不就一直被冠名曰「自然災害」，並且以社論、歷史著作、教科書等等方式，讓廣大非親歷者相信了嗎？就是今天，也還有許多年輕人對那些餓死者的天文數字半信半疑：「有這種事？誇大了吧？」

正因為過去許多助災為虐的人禍未能被及時揭露，甚至反被成

功地隱瞞，今天的各種天災，包括川陝甘地震，才得到這麼多人禍的推助而惡威大增。倘若這一次還是如此，幾年之後，人們除了天威莫測、舉國同哀，對這一場災難就沒有別的印象了，那麼，災區的近十萬死者、數十萬傷殘者和更多的無家可歸者，真可以說是白死、白傷、白受難了。

一定要打破這個惡性的迴圈！

## 二

能打破嗎？

今日中國，政府獨大，能不能打破那個惡性循環，先得看它。

這一次救災，中央政府表現不俗，反應之快，調動其行政、軍事和象徵資源之有力，都是1949年建國以來沒有過的。

大凡集權程度比較高的政府，一遇到緊急情況，都會本能地加強控制，最好把什麼都捏在手裡。但這一次，中央政府明顯克制了這種本能：允許大批志願者進入災區，允許若干境外的救援隊參與搜救，還允許「牛博網」這樣的非官方募捐管道繼續運行……這更是1949年以來沒有見過的。

「黨和政府」的「喉舌」，以中央電視台為首的電視媒體，這一次也表現不凡：24小時滾動播出；逐日公告死傷數據；震後第二天就宣布：死亡人數將在5萬以上——其時能核實的死亡人數還不到2萬，緊接著更直播民政部對中外記者的報告：已經向災區運去了7萬條屍袋……。要到多年以後，人民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了24萬人，而非當時政府公布的10萬人，兩相對照，這一次官方媒體對大規模民事災情的實報程度，也是1949年以來沒有見過的吧。

從道理上講，政府救災，是應該的，這是它必須履行的公共責任，沒什麼可誇耀的，人民更不必驚喜和感激。如果太多這樣的誇耀、驚喜和感激，那只能說明，我們的——不僅僅是對本國的——記

憶太黑暗了。

但是，光用「理當如何」這一把尺，並不足以測量現實的世界。人民之所以對中央政府翹起大拇指，心情其實相當複雜。有切身的感激，一位災區小鎮的下崗女工就明確對我說：「這一次要不是解放軍，老百姓就苦了！」也有不自覺的無奈：「升斗小民，無物可恃，不靠政府，靠誰？」有追昔撫今的感慨：「不管過去怎麼樣，這一回終究進步了嘛。」更有著眼於將來的期盼：「請往這個方向努力吧！恰似智慧的老母，鼓勵和引導兒郎繼續走正道」……

「政府」並非兩個字，也不是一塊板。它當然有強大的逐利本能，但「利益」卻是多種多樣：地區、部門的利益，還是政府總體的利益？近在眼前的誘惑，還是將來的長遠的效應？它的頭腦也不單一：機關裡長久養成的慣性，決策者個人的品質，赤裸裸的功利權衡，不只是一時衝動的道德自許……一旦權衡利益，這些都會跑出來打架。它更受縛於各種歷史和現實條件：從解放軍露宿街頭、不擾上海市民的照片，到「準備死2億5千萬人，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狂言，從「3年自然災害」和「四·五天安門事件」，到「以民為本」和「為人民服務」……都是它的施政傳統的一部分；今年初春的大雪，奧運會的火炬，拉薩騷亂，「東突」爆炸，20年財富總量的急劇增長和分配欠公，社會內部各種矛盾的緩慢激化，「與世界接軌」的既定國策，緬甸軍政府拒絕外援的惡劣影響……國內外各種現實情況，也都在它這次的救災行動中顯出了影響。

倘說，它過去就不是只有一個意志，也並不都能一意孤行，那現在，它就更不是這樣了。

看一個具體的例子：它這一次如何管制輿論。地震一來，宣傳部門習慣性地收緊韁繩，電話指令一個接一個往下發。但是，大批記者蜂擁入川，其中許多人是自發前往，慘烈的災情通過他們發回的圖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類媒體的編輯和播放室，由此激發的報導衝動，顯然不是那些電話能夠完全約束的。時值奧運會前夕，境外記者早已雲集國內；互聯網時代了，災區內外的熱心網民，誰都能夠用手

機和電腦上傳真真假假的見聞：在這情形之下，也不會有誰還想全面封鎖資訊，自陷被動吧？「收」「放」結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正是這多種因素的合力，成就了一套管制資訊、引導輿論的新作法：放鬆對民事災況報導的限制，但要求側重天災，避談人禍；允許介紹民間的救助，更要求突出宣傳政府……也正是這套新作法，形就了一個凸顯民事災情的新空間，它足以容納傳媒人員最初的大部分情感反應，短短一兩天裡，一個以「24小時直播」、「如實報導民事災況」、「高強度渲染悲情」和「突出政府領導人親民形象」為主要特徵的新的傳播模式，就在其中迅速形成，並在最初的一周裡，引獲觀眾的廣泛共鳴。

惟其一定程度地放了，讓「震驚」、「悲情」和「愛心」有了宣洩的管道，其後的逐步收緊，才能一路順行。總體來看，這一次政府對輿論的管制相當成功，主要電視台、報刊和門戶網站的資訊發佈基本一致，言論上的差異空間也很窄小。

但惟其放得有限，奪人眼目的新的報導空間，又很快暴露出邊界太清晰、幅度有限的弱點，整個傳媒的運作，隨之顯現疲態。十餘年畸形「市場化」養成的傳媒習性：過分依賴電腦技術、為爭奪眼球不顧其餘、多數業者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思考能力……更放大了主流媒體在這逼仄空間裡成敗相隨的窘境：它們的確顯示了煽引民情、聚集人心的巨大能量，但它們同樣顯示了，如果沒有其他補充——例如多樣的公共資訊和深度分析，這種能量會很快耗盡。公眾因此四散的資訊需求，猶如順流直瀉的河水，會隨時在遭遇阻礙的地方，釀成新的緊張。甕安民變之後的網上反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中國的「政府」，真是比其他地方的「大」很多。要是政府垮了，憲法、國旗、政治和經濟制度，乃至疆域，都勢必隨之改變：政府和國家，事實上已經混為一體。最近半個多世紀，先是「社會主義」，接著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將社會原有的各種經絡掃蕩一空，政府也就成了唯一的整合系統，這次災區，哪裡的政府散

了，哪裡就會大亂：這個已經和國家混為一體的政府，差不多又和社會混為一體了。

正是這個「大」，給了政府動員和管制中國的巨大力量，但也是這個「大」，讓它常常不大像一個整一的運轉靈敏的有機體，零件四散，各轉各的；甚至不大像一個穩定的輪廓清晰的固體物，體制內外、乃至中國內外的許多界限，日益模糊。

因此，從「政府」這個角度，我們就看到這樣一幅圖景：龐大的行政和體制性力量，在深廣的社會巨變中撲騰起伏。它常常固執己意，有時也不得不順從時勢。當積習發作的時候，它好像要拉著社會退回過去，實際上卻不可能，總有一些打開的門窗鎖不回去，一些新的空間抹不掉了。它現在內蓄多種勢能，其中幾乎每一種，都與體制——乃至國境——外的同類互相呼應，這些勢能之間的聚合衝突，就勢必越攪越大。雖然看上去波浪不高，大多還只在水面下暗湧，其漩渦卻日漸深廣，已經將整個社會，甚至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捲入了其中。這些勢能當中，有一股特別氣勢洶洶，它左手弄權，右手攏錢，一心將中國推入「權貴資本主義」的軌道，以便獨吞經濟增長的成果。但它越是接近目標，社會越顛簸得厲害，其他勢能的反彈，也就隨之而起。這些反彈並不能完全擋住它，但卻足以震響警報器，讓更多的人意識到，社會的傾斜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那龐大的行政和體制性力量，也不再僅僅顯形為我們熟悉的那個「政府」了。

這就是說，即便在最為狹窄的意義上，「政治」一直在變化之中。在這片領域裡，過去是我們熟悉的那個政府，圍起柵欄、劃定方圓，居高臨下、監管一切；現在不同了，柵欄毀了一大半，地上的劃線橫七豎八，監管者依然攥著最多的工具和資源，其面目和身形卻日漸模糊，有時候你甚至會覺得，這地界上好像沒有「監管」了，什麼勢力都可以進來撈一把……。目睹這樣的現實，一個對政治抱有理想的人，多半很洩氣吧？但如果仔細分析，你多半又會覺得，事情並不是那麼無望。這一次災情對上下各界的衝擊，就給了我們許多對政治的正面感受，儘管我們都明白，一旦情況變化，別樣的感受一定襲來。因此，當我說「先得要看政府」的時候，不是說大家只能仰頭等

待，看它給我們多大信心，而是說要從「政府」這一扇視窗，去瞭解行政和體制性力量的變化，看清其活動領域的新的狀況。這領域現在擴展了許多，邊界也不再如昔日那麼封閉，這一次的救災更確實顯示了，不但惡性的因素紛紛介入，良性的因素也能夠介入，並且發揮相當的影響。當意識到政治變化所蘊含的種種不良趨向的時候，也要充分看到，良性的趨向同樣存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說，打破那個惡性循環是可能的。

### 三

這一次最給人信心的，還是民衆。民間捐款和捐血之快、數額之高，均為近年所無；大批遠地的志願者——主要來自經濟發達地區的中等收入階層，也有其他地區的工人和農民——入川救災，更是前所未有。比起官員、資本家和其他公眾人物，普通民衆的救災熱忱本色得多，也積極得多。

這熱忱的背後，是某種模糊的共命運感。雖然還是內外有別，對川陝甘災民的巨大同情，並沒有擴展到緬甸災民的頭上，你甚至可以預料，今後對於鄰國的災難，大多數中國人依然會很冷淡，但是，確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現出了對一己之私的超越。「別的都讓開，救人要緊！」、「人人都會遭難，這時候就別分你我啦！」、「太慘了！我得做點什麼！」、「平安就好，今後要珍惜生活啊！」……3個月來，這些遍布災區內外的言行，無論其為積極還是消極，都讓你強烈地感覺到，災難時刻的人民，真是打開了心胸，和平時大不一樣。

不必把這熱忱歸因於某段歷史時期，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它當然從這些時期得到滋養，1950年代形成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198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都在它這一次的爆發中閃耀光彩；但它也在這些時期遭受損害，「文革」造成的至少兩代人對「人心」的疑懼，1989年以後民衆公共意識的普遍消退，至今還很深刻。我覺得，這一次人民的熱忱其實有更長遠的歷

史根源。至少晚清以來，每當中國發生大難，民衆都會表現出巨大的救援熱忱和共命運感，每一個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不會忘記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

中國這麼巨大，有這麼悠久的文明歷史，民間積蓄的這種爆發式的精神能量，是無論遭遇怎樣的惡劣狀況，都不會完全消滅的。即便一時遭受重創，只要有幾十年的和平，一般社會狀況不那麼緊張，它就會逐漸恢復，重新滋長。「文革」結束至今，三十多年沒有大的戰爭和社會動亂了，社會財富的總量快速增長，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比過去有所提高，不說中上階層，就是許多普通人家，也有了援助他人的經濟能力，再加上這一次的視覺媒體，以空前規模和頻率實報災況、渲染悲情：在這種情形之下，民衆怎麼會不奮起救援呢？

當然，再可觀的能量，只要是因災難而驟起的，多半隨著災難的平復而疾退，不能期望人民的「不一樣」，在災後還能長久延續，那些被壓抑的精神陋習，難免捲土重來。

但是，這一次的情形似乎又不同。地震之前，拉薩騷亂和奧運火炬事件，已經強烈刺激了民衆，地震再一來，民衆——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白領青年和大學生——的情感爆發，就必然不止是針對腹地的災難，也同時指向海外的壓力。對受災者的深切同情、對西方媒體的無知和傲慢的反感、對逆境中的弱者的感同身受和共命運感、要戰勝所有壓到我們頭上的困難的強烈願望……前幾個月已經被激起的愛國情緒，迅速聚化為對「中國」及其「一定會強大」的激情認同。5月19日全國哀悼日，數萬人聚集於天安門廣場，眼淚和拳頭交相輝映：「四川，挺住！」、「中國，挺住！」、「中國一定會強大！」，差不多10年沒見過這樣大規模的愛國熱情的自發表現了。置身這些口號、標語和旗幟之海，大概誰都覺得，人心不會再冷下去，歷史應該翻開新的一頁了？

不難看出這情形的正面意義。它至少說明，無論中國人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和信心如何受挫，也無論「市場經濟改革」如何軟硬兼施，誘迫人們聚焦於個人的物質生活，更無論媒體如何教導人們遠離

「崇高」，到「消費」中去體會「人生」、「成功」的意義，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依然需要認同某種（些）精神的價值，某種（些）個人物質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至少現在，中國人還不是一個甘於當「經濟動物」的民族。

不過，和社會各階層普遍同情災民不一樣，到目前為止，只有部分民衆明顯表現出對「中國」及其「強大」的認同。這也正常。通訊再發達的社會，總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條件表達自己，其他人——往往是多數——默不做聲。當電視、主流報刊和網路讓你覺得，是那些經濟發達地區——尤其大中城市裡——的、198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屬於中等收入階層或還在大學讀書的、多半沒有直接受災或目睹災況的人，充當了這一波愛國熱潮的主體人群，我們一定得記住，大多數人還沒有說話，不知道他們怎麼想。

這些沉默者當中，一定有許多人不贊同、甚至並不在意這一波愛國熱潮吧，儘管他們親近自己生活的這一片土地，且根據不同的定義，都覺得自己是愛國者。但我相信，媒體呈現的這個高呼「中國」的主體人群，並非全是虛幻，即便在那無聲的大多數人中間，它也有若干代表性。

如果這兩個假定大體不錯，那我就有一連串問題，要在這裡提出來：

首先，這個主體人群認同的是什麼「中國」？

前面說過，現代中國革命的政治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與譬如現代西方明顯不同的政府／國家／社會狀態，不但政府和國家很難分開，社會也和它們深度結合。與此相應，現代漢語對這些政治概念的命名和使用，也是籠而統之，譬如英文的country和state，差別甚大，我們卻都稱爲「國家」，甚至government，政府，也常常自稱「國家」，以至一般人在表達——亦在認識——上，並不習慣區分不同涵義的「國家」，甚至不習慣區分「政府」與「國家」。

正是這種現實的混雜和命名的籠統，給了「國家」一個充當頂級價值名目的可能。至少這大半年裡，它就表現了極大的凝聚力，將

「民族」、「中華文明」、「現代化」、「全球化」等等，都含糊地吸收為自己的一部分。它儼然成了許多中國人公共認同的首要物件，其他風雲一時的概念：「人類」、「世界」、「個人」、「人民」、「社會主義」、「階級」……好像都無力與之抗衡了。

但也正是這樣的現實和命名，讓我們實際上對「國家」又很困惑。一個對政府和基本制度有較大反感的人，很容易冷淡國家和社會，覺得這些和自己沒什麼關係。我們看看四周就知道，這樣的人真是不少。也有許多人不想走得這麼遠，他們依然願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愛這個國家，但其所愛之「國」，通常偏於抽象：「中華文明」啦、「吾土吾民」啦，似乎只有避開具體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度，他們才能安心愛國。另外還有一些人，是主要到與別國的交涉——包括現代史上對這交涉的屈辱記憶——中，去體會「國家」的意義的：護照、關稅、領土、能源短缺、南京大屠殺……但是，這樣的體會往往需要一段與國內實際政治生活的距離作為保障，一旦這個距離縮短、消失了，就很容易被沖散。單靠「鴉片戰爭」和「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歷史知識，很難長久維持一個人的愛國之心。

一群人坐在一起，每個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你仔細問一遍，大家所愛之「國」，十之八九都不一樣：這樣的情形，見得還少嗎？

中國的現代之路，走得和許多別國都不一樣，中國人對「國家」的體認，一定和許多別國人不同。這一波愛國熱潮的主體人群，所愛的究竟是什麼呢？應該不再是上面所列的幾種了吧？那是什麼呢？是由制度、疆域、人口及其符號系統構成的現實的「國家」？是中央政府所握執的日益壯大的「國力」？或者比上列的幾種更模糊，只是一個與政治／語言現實一樣籠而統之、難以明確的情感的「中國」？

其次，這個主體人群是經由何種精神或物質途徑，體會到「中國」之值得認同的？

我首先想到這一些途徑：這一次中央政府全力救災，充分顯示了「國家」的實力和重要；身為人口和疆域大國的知識國民，卻在最近30年深切感受到與西方相比的「落後」的自卑，再加上悠久文明的歷

史記憶，自然激聚成對中國之強大的由衷渴望；最近20年GDP持續增長，中等收入階層的物質生活明顯改善，可以買公寓、買汽車、出國旅遊、到紐約第五大道和巴黎老佛爺(Lafayette)百貨公司去購物，北京、上海與倫敦、東京的「硬體」差距，更是快速縮小；這些似乎都確證了中國的「崛起」，令人很容易對陪伴——乃至主導——這一切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發生好感……

當然還有別的途徑；就是上列的這一些，也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核實。但我們不妨就沿著這些途徑所凸顯的方向，繼續提問。

#### 四

今日中國各種思想的一個交鋒點，是如何評價最近25年——特別是1992年以來——的「改革」。這一波愛國熱潮是從怎樣的角度加入這個交鋒的？從我上面列出的那些途徑來看，它的至少一個重要來源，是其主體人群對經濟持續發展、消費水準逐漸提高、國家諸種硬實力明顯壯大等物質狀況的切身體會。這是不是意味著，這個人群所代表的對於「中國」的新認同，正內含了一種對於「改革」的總體的肯定？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種與「毛澤東思想」明顯不同的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日漸成形。作為1992年再次發力的「市場經濟改革」的孿生兄弟，它很自然地充當了這場「改革」的首席宣講師，我也因此暫名其曰「改革主義」。倘說這一波愛國熱潮在事實上增強了肯定「改革」的聲浪，那它和「改革主義」是什麼關係？是提供了對「改革」的另一種認識，雖然也是正面的，但角度不同，因而形成了對「改革主義」的某種突破？或者相反，它正是「改革主義」的衍生物，標誌著其國際面向的初步成形？用「改革主義」的一個流行符號來說，21世紀的「成功人士」不但依舊滿口英文，而且開始鼓噪「大國」的「崛起」了。和對「美國模式」的崇拜相比，也許這樣的鼓噪聲，才更能表現「成功人士」的成熟的政治意識和全球關懷，令它的形象趨

於完整？

人們常說，1989年之後的政治和經濟狀況，迫使中國人主要從「個人」和「物質」——而非也從「社會」和「精神」——的角度去確定自己的生活意義。最近20年的社會現實，基本上是印證了這個說法的。那麼，這一波愛國熱潮是否改變了這個現實？如果有改變，程度如何呢？從民衆對一己之私的相當普遍的超越，可以說它確實促成了那個被「個人」角度遮蔽的「社會」——或「公共」——角度的部分的重現；我們能不能說，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那個被「物質」角度扭曲了的「精神」角度的重現呢？

倘若回答是肯定的，那是什麼樣的精神的角度呢？是前面談到過的那種對抽象「逆境」的體認嗎？當人們將「地震」和「西方」歸為一類，高呼「四川」和「中國」一同「挺住」的時候，你確實能感受到這種體認在沸騰：對災難的震驚、對「西方」的失望、屈辱的歷史記憶、現實生活的壓抑感、不甘心「就這麼算了」的衝動、怎麼也難滅絕的好勝和自尊心……一旦某個突發事件將所有這些吸聚到一起，形成一個「陷身逆境、自強不息」的想像的位置，許多還對人生和世界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就很容易被它吸引，要站進其中，領受鼓舞。晚清以來，這樣的情景一再發生。我甚至覺得，在今天，這樣的搭建在逆境之自覺上面的精神位置，可能比「傳統文化」或「黃皮膚黑眼睛」更有感召力，更能將實際分立於不同社會位置的人聯繫到一起，令其覺得「都是中國人」。

倘若回答是否定的，那又是為什麼？是因為這一波愛國熱潮，至少是其若干關鍵的構成因素，例如前面談到的那個主體人群體認「中國」之可愛的途徑，依然表現出深刻的唯經濟——甚至是唯物質——傾向，因此並沒有脫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消費」的如來之手？就像公寓和汽車有力地塑造了我們對於「個人」的體認一樣，薪水、中央商務區、出國旅遊的機票等等，也開始有力地牽引我們對「國家」的體認了。從這個角度看，這一波的愛國熱潮，是否正從一個方面，詭異地體現了「消費＝人生」這一全球性價值確立模式的巨大的擴散力？

這一波愛國熱潮的主體人群，基本是由接受了系統學校教育的年輕人構成的。1990年代中期以後，學校教育傾斜得越來越厲害，應試教育模式實際上覆蓋了整個中小學階段，大學教育日漸偏往輕文理、重應用、薪酬導向的軌道，歷史和文化教育的空白點，更是有增無減……照一般的理解，這樣教育出來的人，多半腦子比較簡單、機械，不關心社會，只在乎個人的物質生活和成功。可是，這一次分明有許多平常似乎正是如此的年輕人，積極投身救災熱潮，為「中國」吶喊和落淚。這該如何理解？今天這樣的學校教育，究竟在中等收入的年輕一代及其候補人群身上打下了怎樣的烙印？它是如何作用於他們的社會／精神視野、政治態度和思維能力的？又是如何與同樣作用於他們這些方面的其他社會「教育」——例如傳媒和職場教育——互相呼應或衝突？一個大學畢業的白領，Time Out的訂戶，對街頭乞討的老婦看都不看一眼，每日孜孜於賺取償還按揭（按：指房貸）之款，這一次卻對著電視機裡的國旗泫然淚下，還衝動地報名去北川當志願者——儘管後來沒去成：如果你和他面對面，你怎麼理解他？是覺得他內心分裂？還是覺得很正常，種種看似矛盾的心理和行為底下，其實有更深的相通，而這相通的奠基者之一，正是他從7歲開始接受的16年的學校教育。

5月19日天安門廣場上群情激憤的年輕人，似乎再一次證實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社會或集體認同，通常是從對第一世界的抵抗中獲得動力。自晚清以來，幾乎所有政治人物、軍人和文化人，只要談到「新中國」——無論那是什麼顏色的，都認定它應該「強大」，似乎不「崛起」，就沒有中國之「新」。而這「強大」或「崛起」的具體內容，則每每因時而異，有時候說得相當清晰，有時候一團模糊，只是一句口號。那麼，這一波愛國熱潮祭出的「強大」二字，是怎樣的涵義呢？是世界首富？軍威最盛？或者民權發達？精神文化闊步全球？還是又和以前多次出現的那樣，並無清晰內涵，只是一團模糊？

目前來看，答案好像是後者，大半年來，政治人物和文化人，更不要說那些激動的年輕人了，對國家未來的描繪，線條依然極粗。這也自然。如今整個世界，大凡有點頭腦的，都對人類的未來深感迷

惘。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好像都斷了，資本主義自己的毛病，卻越來越重，各種現成的政治和社會理論，又都給不出足夠的光亮，在現實的黑暗中四面摸索，就成了大家共同的命運。我們當然也不例外。

這是一般而言，中國更有特殊之處。今日中國大地上，支配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實踐，已經遠遠超出現有理論能夠照亮的範圍，也明顯偏離了西方主流現實指示的方向，因此，無論今後實際的國家形態，還是人民對這國家的體認，也無論從一般的立場來看，它們是令人欣慰，還是引人擔憂，都勢必與20世紀見慣的不同，是新的面目，也是新的路徑，更是新的緊張。在沒有路標的荒地上走，再順當也快不了，何況一定常常迷路，進一步繞兩步的，更加費時。從這個角度看，這一波愛國熱潮在國家認同上的空洞和模糊，正是不可避免的吧。甚至還可以因此樂觀：它們是不是也為新的社會思想和實踐，騰出了不斷填充「國家」認同的寬大的空間？

社會氣氛明顯轉變的時候，知識分子總是特別敏感。中央政府和民衆的積極救災，引起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激賞，他們由此反省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界的言行傳統，例如總是從批判的立場看待現實，覺得民衆容易受蒙蔽等等。倘說整個1990年代，知識界區分「翼」別的主要界限，是看你尊崇「個人」自由，還是強調「階級」——或者溫和一點，「階層」——衝突，現在卻有第三個基點浮升上來：「國家」的「崛起」。儘管這「國家」的涵義，似乎眾說紛紜，其中有一個傾向，卻相當清晰：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局勢，現實的「國家利益」，應該成為權衡取捨的主要標竿。無論30、40歲，還是50、60歲，也無論以前常被視為何種「主義」，似乎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都開始談論「國家」，在新一波愛國熱潮的洶湧中，不乏知識分子的弄潮身影。

總體來看，這自然是表現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歷史敏感。從康有為的時代起，中國人就一直盼望自己的國家「站起來」。政治人物多次宣布已經「站起來了」，但人民最後卻每每失望，因為發現還是站得遠不夠挺直。但是，這一次似乎不同，中國第一次在GDP的絕對數值上持續飆升，接近世界的前幾位，以至西方都有人預測，50年後中

國在經濟上世界第一。正是這個新的情況，讓許多人相信，中國這一次真是臨近了「大國崛起」的歷史轉捩點，知識分子必須拿出新的思路，展開更為積極的行動。

但也還有一些具體的原因，要分開來講。

近年來，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膨脹，現實越益嚴峻，另一方面是知識界和整個社會情緒的低落，萎靡不振，這兩方面的匯合，激起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迫切地想抓住某種堅實可靠的東西，自我激勵。而無論「國家」還是「人民」，此時都比那些傅柯式的(Foucauldian)、每每致人無處立足的激進理論實用得多，他們當然要轉向它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學校園內外，傅柯(M. Foucault)、德里達(J. Derrida)等等領頭的西方批判理論，一直影響巨大。但今天，如果知識分子的這一堪稱激烈的轉變持續蔓延，西方批判理論還能保持這樣的影響力嗎？更重要的是，轉變中的知識分子，如何處理已經堆積在自己思想中的那些激進的理論片段？

由於嚴格的資訊管制，今天30歲以下的人，普遍不瞭解1989年的巨大風波，今天40歲以下的人，普遍不瞭解「文革」和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政治和社會狀況。這些歷史記憶的欠缺，顯然也影響了許多人對「國家」的現實形態的判斷。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一直是在全球視野中把握中國問題的，儘管從不同的眼睛看過去，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今日世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獨大。你越是不願接受這個現實，越是關注如何制衡美國之獨大，就越會覺得，中國必須強大，中國的發展，應該以「強大」為首要目標。而越是瞭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你可能又會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寄希望於中央政府。只有一個強有力、同時比較開明的中央政府，才能遏制吏治之腐敗、保持社會之穩定、國家之統一，進而達致中國之強大……在這樣的思路中，現實行動的可能性似乎成了思考的第一要義，對世界大局的關注，也很容易令人忽略中國社會內部那些不能被「強大」代表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正是對中國在中美或中西方關係中被壓抑的弱者位

置的充分自覺，導致了應該在自己國內尊崇強者——「國家」——的思路。在國際上是這樣，到了國內卻那樣，二者的種種不一致，是否正體現了現代中國的左翼思想和革命實踐的某種悖論式的宿命？

.....

一連串問題。至少此刻還難有完整的答案。但我因此明白了：潮水勢將退去，地形卻已經改變。當人民的救災熱忱和愛國激情逐漸消散的時候，它們衝開的那些社會和人心的空間，它們對新的思想、精神和行動的召喚，卻繼續存在。

## 五

可以很快地列出一系列川陝甘地震後的新氣象：

中央和災區各級政府順應民意而打開的若干空間，特別是「志願者」的大規模行動模式及空間；

在各界踴躍救災中凸顯的「人民」、「80年代生人」等等的正面形象，它們能部分地消除積久形成的普遍的沮喪和放棄感；

全民救災和愛國熱潮所顯示的人民內在的公共認同的需求，將近20年裡，它是第一次以如此規模釋放出來；

民衆因非常局勢形成的對官僚腐敗等等不願麻木對待、奮起鬥爭的熱忱，這開始主要是表現在災區，但也在向其他地方擴展；

民衆實際救災獲得的在現實條件下開展公共行動的經驗，其中當然不只有積極的部分，但就是其消極部分，亦有相當的正面意義；

地震及其前後事件所提供的新的觀察點和分析角度，知識界如能及時抓住這些新的思考條件，當可對現實做出有力的分析……

但是，另一面的情況也不容小覷：

就災區而言，一旦渡過最初的失序狀態，新的政府管制體系重建

起來，在救災過程中開放的各種空間，有可能被縮小以至關閉；

如果災後重建的巨額投資，依然由地方政府一手分配，如果住房和生計被嚴重毀壞的當地民衆，不得不比災前更依賴政府，新的貪污腐敗就很容易滋生，而且比災前更少阻礙……

事實上，現實社會的各種負面狀況，若干政府和國家機器的積久形成的運作慣性，正在以各種方式，將激動起來的社會——不止是災區——拽回過去的萎靡狀態。要想保持和擴展上列的各種新氣象，順勢推進社會的良性改造，並非易事。

在這兩面混雜的情形中，像我這樣的學院知識分子，能做什麼？

可以努力瞭解和傳播多樣的災況和救災資訊，揭發那些總是有人想要捂住的人禍，持續追究其製造者的責任。

可以持續關注救災和重建的資金問題，從「如何使用四百多億社會募捐」，到「如何使用所有公共資金」，從增加各級財政預算的透明和公平度，到建立一套可有效監督的公共資金分配制度，將因非常狀態而起的對於各類制度建設的關注，擴展為對平時的更大範圍的同類現象的干預。

可以用言論支援和親身參與等等方式，擴大在救災中打開的民主參與的實踐空間。這樣的空間並不意味著與國家機器的必然對立，恰恰相反，就實情而言，它幾乎必然要與那機器的運作結成多樣的非對抗的關係，這也常常正是它得以成形的前提條件。不過，我還是要說：這樣的空間應該逐步擴大它的「民間」意味，而不是最後被收編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如果那樣了，無論對社會、國家還是政府，都不是好事情。

更可以瞪大眼睛，密切關注災後重建的整個進程，警惕官僚和國內外資產階級聯手攫利，加重災民、中央政府和各地捐助者的負擔。如果各方努力，因抗災而激發的勃勃民氣，能夠轉化為持續參與和監督重建事宜的正面力量，那就有可能將災後重建發展為某種良性建設的「試驗」專案，為整個社會的全面改善提供經驗和教訓。

當然，和以上四件事相比，我們更該做、也可能做得較好的，是第五件事：發展新的公共認同，推動社會形成促其良性改變的精神依據。

一個現代社會，要想長治久安，就不能只靠各階層之間——以及其內——的利益平衡。它必須建立公共的價值認同，來充當自己的精神依據。倘若說在今天，「如何看待『國家』」，已經成了一張反映今日中國人公共認同之普遍狀況的最有效的測紙，甚至在一定範圍內，「國家」已經成了公共認同的一個新焦點，知識分子建設良性公共認同的首選的著力點，就應該也是「國家」。

即便「社會主義」時期和「改革」的前二十年，常常有別的流行辭彙蓋住了「國家」，中國人也一直是很愛國的。正因此，從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如果其中的那些假定和估計能被證實，這一波愛國熱潮確實顯示了中國人認同「國家」的若干新形式：對個人物質生活的「正面」體驗，對中央政府的行政、資金和軍事力量的「正面」感受……並不是說人民過去就沒有這類體驗和感受，但至少最近三十年裡，這類體驗和感受好像是第一次這麼普遍而強烈地表現出來。

這些年，不斷有雄辯者告訴我們，全球化時代了，「國家」不重要了。像我這樣讀著魯迅長大、後來又讀過一些馬克思的人，也不會真覺得「國家」有多麼神聖。但是，我看重這一次全民救災，也看重這一波愛國熱潮，因為它們表現了人民公共認同的深厚潛能，如今的中國，是太需要這潛能的勃發了。我們被各種各樣的事情弄得獐頭鼠目、四分五裂，現在是太需要舒展身心，抖擻精神，堂堂正正做一回中國人了！

但唯其如此，中國人的公共認同，就不能只是被一個「國家」圈住；我們對於「國家」的熱愛，也不能都——甚至不能主要——依靠對個人收入和物質國力的自得。這些都是不穩定的，也多半不持久的，一段時間的經濟停滯，到處可能發生的負面的政治感受，會極大地破壞它們，進而挫敗那寶貴的、正借它們以顯形的社會——不只是心理——能量。

所以，知識分子應該更大聲地、也更多樣、更辯證地來討論「國家」。不只是讚嘆那些新的愛國體驗和感受，更是接著它們往下講，往前講，擴展和豐富它們，創造人民公共認同的更寬闊的前景：

——勾勒人的生活世界的完整輪廓，特別是描述那些被日常物質消費所遮蔽的生活內容：人們越是發現自己意識到的生活經驗是片面的，就越不會滿足於經濟發展之類的單項目標，而會轉而要求人的生活的全方面改善；

——進一步擴展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深入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地方、階層等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人們一旦認識到「政府獨大的政治狀況」與「實際社會生活的多樣關係和潛在能量」之間的深刻矛盾，就不會再讓「政府／國家」擋住自己的全部視野，而隨著對別的那些至少和「國家」同樣重要的社會層面的體察不斷深入，人們對「現實」的範圍的理解，勢必大大拓展；

——深入描述150年來中國被動現代化的曲折歷史，特別是描述「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等等在此段歷史中形成和變遷的豐富過程，打破現行教育和傳媒體制對這一段歷史之論述的深刻限制：正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瞭解，能讓國人在現實刺激面前保持清醒，在深切體驗的同時，不喪失鳥瞰式的判斷能力；

——深化國人對國際和全球問題的理解，特別是強調中國對於全球應負的歷史責任：只有充分意識到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嚴重傾斜和難以為繼，同時意識到中國對於探尋合乎道義的全球秩序能起的作用，人們才不會只是一門心思要與現行「世界」「接軌」，也不會兩眼只盯住國際競爭、將道義丟諸腦後，而願意發展真正有氣度、擔責任的大國之國民／政府的精神和風度；

——展開對於「我們所希望的國家」的充分討論，由此展開國家認同的「未來」面向，事實上，這個面向正是被動現代化的社會在國家認同上與英國那樣的先發現代化社會的最大區別所在；如果這個面向能充分展開，就可以破解今日的基本政治現實——政府、國家和社會混成一團——給國人造成的困惑，避免「國家」成為權貴階級的令

旗，將其轉化成推動政府和社會良性變革的一項重要的正面依據。

……

一句話，要努力拓寬「國家」和國家認同的涵義。這也就是從一個關鍵的方面，拓寬中國人的公共認同的涵義。

無論是一個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邏輯支配的政府，還是一個短視的、缺乏政治頭腦的資產階級，它們都會竭力縮小「國家」和國家認同的涵義，抹殺人民公共認同的需要。知識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只有當「國家」成爲一種包含了多樣側面的指向未來的價值目標，能將我們的視線引入遠遠比「國家」廣闊得多的世界，我們對它的熱愛才能經得起打擊，我們也才不至於動不動就跌回冷漠和空虛。

2008年10月改定，上海